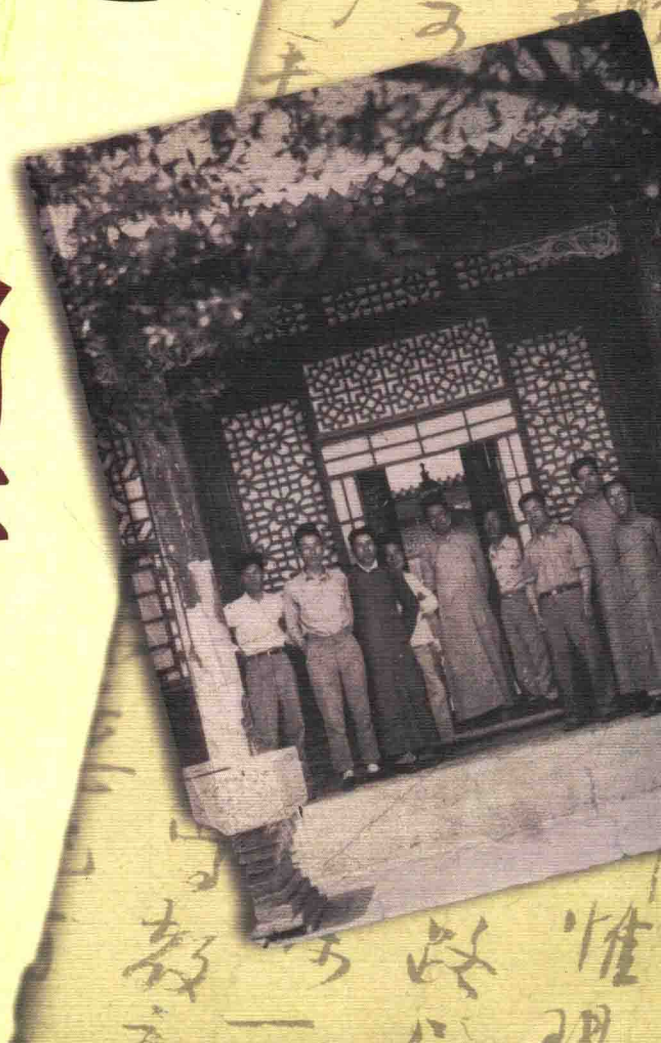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21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21



主編
陳熙遠

編輯委員
李建民 李宗焜 陳維鈞

編輯助理
黎瑞春 陳淑梅 陳靜芬 林峻煒

古今

論衡

【半年刊】

第二十一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ISSN 1561-0594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180 元

翻印須徵得本刊同意

美術構成：黎瑞春

封面設計：魏吉玉

印刷者：惠文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本刊已加入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CEPS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http://www.ceps.com.tw/>)

目錄

新學術之路

- 3 李東華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

研究與討論

- 31 洪金富 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
- 63 王小林 漢字與「言靈」：日本傳統漢字論中的「執拗低音」
- 83 范家偉 魏晉南北朝隋唐醫者與醫學

田野調查

- 115 徐新建 重疊的邊界：彝族食俗與族群關係

書評&評介

- 133 杜正勝 醫療社會文化史外一章——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序
- 155 顏世鉉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評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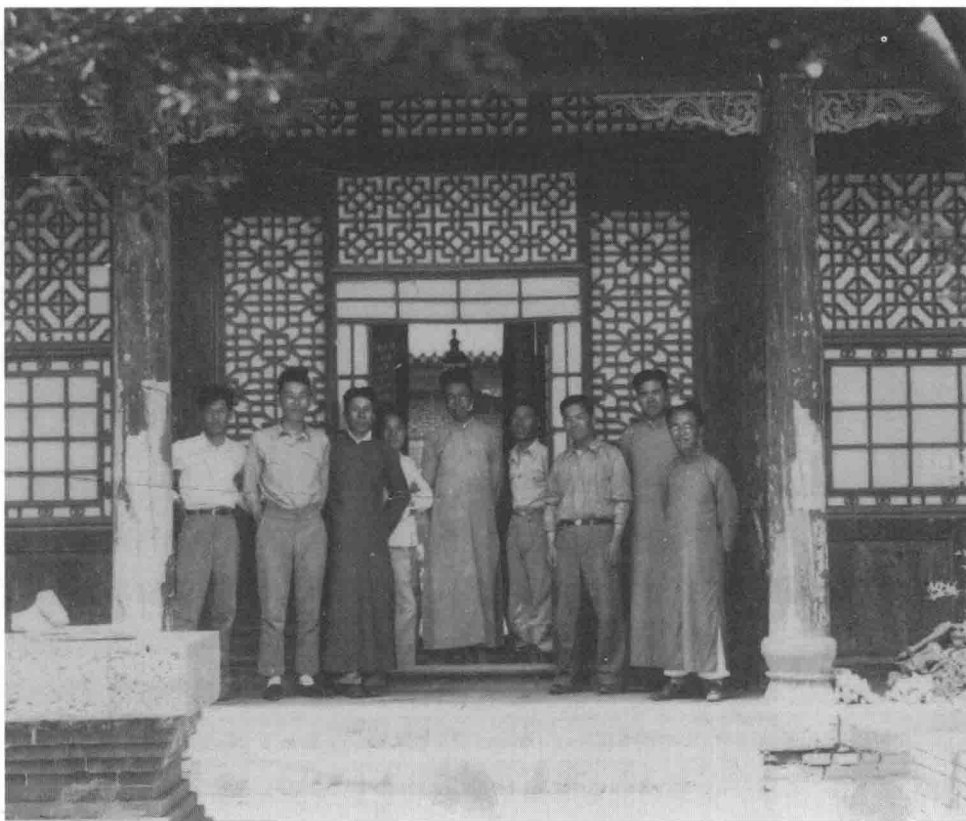
研究動態

- 165 童永昌 「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研討會」紀要
- 173 編後語

目錄

新學術之路	3	李東華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
研究與討論	31	洪金富	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
	63	王小林	漢字與「言靈」：日本傳統漢字論中的「執拗低音」
	83	范家偉	魏晉南北朝隋唐醫者與醫學
田野調查	115	徐新建	重疊的邊界：彝族食俗與族群關係
書評&評介	133	杜正勝	醫療社會文化史外一章——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序
	155	顏世鉉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評介
研究動態	165	童永昌	「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研討會」紀要
	173		編後語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 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



民國二十四年春（1935）殷墟第十一次發掘（西北岡第二次發掘），禮拜日在安陽城內冠帶巷 26 號
過夜前照；左起劉耀、梁思永、夏鼐、尹煥章、李光宇、石璋如、吳金鼎、胡厚宣、祁延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李東華（遺稿）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合聘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 21 期 2010.12

一、前言

夏鼐（作銘，1910-1985）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與所長傅斯年關係非最密切，甚至可說非屬嫡系成員。且二人相處時間，僅自一九四一年初夏鼐自埃及返國到四川南溪李莊中央博物院工作起，一九四九年一月傅氏赴臺擔任臺灣大學校長即告結束，僅有八年時間。如自一九四三年夏鼐入史語所擔任副研究員算起，則更只有五、六年。但在大陸時期史語所二十年的發展史（1928-1948）上，二人關係實係傅斯年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中值得深入瞭解的例證。

夏鼐出身清華歷史系，非屬傅氏任教之北大系統，傅、夏關係足以反映傅與廣東中山、北大嫡系學生之外的另一種關係。此外，夏鼐係史語所第二代中少見留學英倫而習考古之學者，傅、夏關係足以反映傅氏與留洋返國新一代異領域（非歷史領域）學者之關係。尤其重要者，夏鼐到所後，以區區四年之資歷（1943-1947）及副研究員之資格，竟於傅氏出國治病期間（1947.6-1948.8），為傅揀選為所長代理人，承擔艱鉅。此一例證，足以反映傅氏對新一代領導學人之揀拔與看法。本人所以以傅與夏之交往為題，其主因在此。

二、傅斯年對夏鼐治學途徑的指導與影響

追索傅、夏關係，以文獻資料來看，僅能回溯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夏鼐考獲清華獎學金（布克爾基金會）留學之時。其前夏鼐之由燕京大學歷史系轉學清華（1931）；在清華時期（1931-1934），他如何在《清華周刊》發表論文，如何與吳晗交好，如何繼吳擔任《清華周刊》文字欄主任（1933年，第39卷），又如何於畢業前夕（1934年5月）共組（清華）史學研究會等事，^①與在史語所及北大的傅氏均無涉。一九三四年七月，夏鼐自清華歷史系畢業，畢業論文《太平天國前後長江流域各省之田賦問題》，主要以中國近代經濟史為研究方向。同年十月，夏鼐考獲清華考古組獎學金（布克爾基金會），將赴歐、美研習考古。^②夏鼐考上後，由清華指定李濟（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及傅斯年（史語所所長）二人為導師，在二人指導下做出洋前之預備工

① 詳參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社會科學戰線》1980.2：24-25。

② 參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100。

作。由於夏鼐畢業於清華歷史系，考上考古組純屬偶然，^③故夏一方面勉力補習考古學知識，一方面按考古組獎學金之規定，在出國前必須有田野發掘的經歷，故在李濟安排下，趕著參與李濟、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商代墓葬的發掘工作，為時數月。該次發掘是第十一次安陽發掘，時間由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至六月十五日。^④一九三四年年底，夏鼐以自己改習考古之準備工作不足為由，擬向清華申請延後一年出國，以便再留國內做準備。但二位導師以國內考古學之標本實物極為缺乏，且二導師工作又極為繁忙，無暇指導為由，勸夏鼐早日出國為是。^⑤夏鼐甚至一度因對自身考古根柢缺乏自信，企圖再回頭轉習近代經濟史，在各方努力均不得要領下，最後只得於一九三五年九月硬著頭皮出國，^⑥「將來或即專攻從事漢代方面之考古」。^⑦

由於當時中國考古界前輩李濟與梁思永皆畢業於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及考古學），夏鼐原擬赴美留學，但二人之導師狄克遜（Roland Burrage Dixon, 1875-1934）教授適於是年病故，李、梁遂建議夏鼐赴英留學。^⑧梁思永以愛丁堡大學柴爾德（Gordon Childe, 1892-1957）教授為史前考古權威，故主張夏鼐入愛大；李濟則以為倫敦大學考古系之歷史較久，設備較周，主張先入倫大，^⑨以後或轉學愛大，或續學於倫大，由夏鼐觀察情形，再作決定。其後因李濟替夏鼐向他認識的、在倫大教授中國美術、考古之葉茲（W. Perceval Yetts, 1878-1957）教授寫介紹信，夏鼐遂入葉茲之藝術所（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為研究生，並由校方指定葉茲為導師。^⑩

夏鼐在倫大第一年，雖在藝術所葉茲指導下攻讀，但夏氏十分勤奮，所修課程多達十門。除藝術所之「中國青銅器」、「陶瓷」及「考古遺存的田野發掘與室內整理」三門課外，尚選修外所之「普通測量學」、「礦物和岩石學」、「博物館考古學」、「田野考古的目的和方法」、「考古繪圖」、「青銅冶鑄」及「體質人類學」等七門課程，夏鼐認為這些考古學技術方面之基礎課程國內極為貧乏，為因應未來返國後之所需，應把握機會，廣泛學習。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夏鼐致書清華梅貽琦校長，要求准予

③ 詳參夏鼐、王世民，〈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6：1-2。

④ 夏與石璋如負責西北崗東區的發掘，主要是小墓葬及一個大車坑，他擅繪圖，把每天挖掘進度以分層、分色的方式，繪圖標示，頗令石璋如誇讚。《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頁104-105。

⑤ 見夏鼐、王世民，〈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頁1-2。

⑥ 詳見夏鼐，〈致梅貽琦函〉（1936.4.11），轉引自夏鼐、王世民，〈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頁1-2。

⑦ 見〈夏鼐致李濟函〉（1945.4.3），轉見劉文鎖、博思源（Clayton D. Brown），〈夏鼐與李濟〉，《古今論衡》20（2009）：64。李濟致Prof. Yetts的推薦信也說：「漢代是夏先生的專長」。見該文頁66。

⑧ 孟甫，〈夏鼐的英倫之旅〉，《溫州日報》2007.6.19。

⑨ 參劉文鎖、博思源，〈夏鼐與李濟〉，頁65-66。

⑩ 孟甫，〈夏鼐的英倫之旅〉。

延長留學年限，由二年改為三年。信中並詳述延長三年後之研究計畫，彼打算在：

- 轉學愛丁堡，從 Childe 教授學史前考古學。
- 轉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系，攻讀埃及有史以後考古學。
- 仍留藝術所，隨葉茲教授涉獵西方考古學（近東及希臘羅馬之上古史與考古學），以研究中西古代之交互影響。

其中夏氏個人最傾向專攻埃及考古學。¹¹夏鼐同時（四月十三日）又致函李濟之請示意見。李以夏函商之於另一導師傅孟真先生。¹²傅氏「甚感興趣」，當日即寫一覆函交李濟回覆夏氏，傅函云：

（前略）頃見致李先生書，敢盡其見如下：按，隨 Yetts 學，實無多少意義，此等大事，不可以“不好意思”了之也。此等外國漢學家，每好以收羅中國學生炫人，然我們可以向之學者甚少。兄與禹銘〔按：吳金鼎，字禹銘〕在彼，恐只備他顧問而已。讀書作學問，雖不可過分務遠，然亦不可不設一高標。二、三年中誠未能多學，然窺一科之門徑，回頭知自己用功即可矣。弟意中國考古學之發達，須有下列專科之研究者，各走一路，合為大成，是此學發達之要也。

1. Prehistory *（史前學）
2. Egyptology（埃及學）
3. Assyriology (including Ancient Asia Minor) *（亞述學，包括古代小亞細亞）¹³
4. Classical Arch.（古典考古學）
5. Byzantine and Arabic Arch.（拜占庭與阿拉伯考古學）
6. Indian Arch. *（印度考古學）
7. Oceanic Arch.（大洋洲考古學）
8. American Arch.（美洲考古學）

他種地域，在中國雖不能直接應用，然意解與方法，皆可取資。上列加*者尤重要，因有直接關係也。其實無論任一行，學好都是好事，只有中國考古，在外國無從學耳。弟意兄不必到愛丁堡，因史前考古，中國已有多人，梁思永先生即其最著者，大家都走一行，亦與此學發展上不便。埃及學未如古代西方亞洲考古之與中國考古發生直接關係，然其意解與方法，可資取證者多矣。故捨

¹¹「惟生已修函奉達導師李濟之先生，陳明此間情形，并表示生意擬專攻埃及考古學，如李先生亦以為然，而校中不加反對，且核准延長年限，生即依此進行」，同註⁵，頁4。

¹²原函未見，估計與夏致梅函內容相去不多。蓋前信述研究歷程極詳也。

¹³「附錄二」為 Orient Asia Minor，疑誤。曾昭燏致傅信（1936.6.19）全引八項專科，載為 Ancient Asia Minor。見夏鼐、王世民，〈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頁4-5。

Yetts 而專學埃及學，弟非常贊成，不必學有所成，即學到半途而返，猶有用處。古文字與語言之補習，暑中可自爲之，不必全然了解，亦可上課。至於向清華接洽延長，當由李先生爲之，想無問題也。聞曾女士〔按：曾昭燏〕亦在 Yetts 處，弟意乞便中告之。¹⁴

本函至關重要，基本上幫助夏鼐決定了未來的學術路徑。由夏鼐致梅貽琦前函，及傅氏覆函對照來看，可以看出傅、夏二人的不同性格。夏氏個性謹慎而處事細膩，對半年多來在英之經歷娓娓道來，清楚完整的呈現了他的看法——決定第二條路轉習埃及考古學，但對其餘二路——去愛丁堡及留隨 Yetts 習考古——亦皆未說死，意欲聽從前輩師長作決定。但傅孟真坦白爽快，以留學過來人經驗，一語道破夏鼐等留學生的境遇。且以居高建瓴之視野，提供了未來中國考古學的最高標的——八項專科研究者之分途並進，合爲大成。較諸李濟之、梁思永之考古學專業學者，傅氏反而有「不在此山中」的高遠看法。他首先以「此等外國漢學家，每好以收羅中國學生炫人，然我們可以向之學者甚少。兄與禹銘在彼，恐只備他顧問耳」一語即否決再隨 Yetts 習中國考古之途。其次，再以「弟意兄不必到愛丁堡，因史前考古，中國已有多人，……大家都走一行，亦與此學發展上不便」，協助夏鼐斷了爲尊重梁思永意見欲轉學愛丁堡之念。並指示：雖然「埃及學未如古代西方亞洲考古之與中國考古發生直接關係」，「然其意解與方法，可資取證者多矣」，成就了夏鼐轉習埃及考古學學門之願望。¹⁵傅氏並以一己之經驗，指引夏氏「古文字與語言之補習，暑中可自爲之，不必全然了解，亦可上課。」基本上，傅氏替夏鼐掃除障礙，決定了研究埃及考古學的新路徑。

傅氏指導留學生，提供一己經驗、看法，一言以決定留學生之終身學術路徑者，除夏鼐外，還有同在倫敦大學的曾昭燏（1909-1964）女士。¹⁶茲一併論述，以爲傅、夏關係之一旁證。傅氏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致夏鼐函，因信末有將己意告曾女士之言，夏氏收到後，將傅信轉給曾昭燏看。曾昭燏即在六月十九日致函傅氏，以自己未來的學業方向向傅氏請教。她以傅氏所提八項專科爲例，說明⑤⑦⑧三項之教研，即拜占庭及阿拉伯考古、大洋洲考古及美洲考古三項，英國全無；史前考古學不必學；古典考古學，倫大與牛津雖有課程，但多注重藝術、雕刻，與中國所需無大關係；印度考古，倫大有少數課程，但十分不完全。倫大考古學中最強者，要算「埃及學」，其

¹⁴ 〈傅斯年致夏鼐函〉（1936.5.8），見夏鼐、王世民，〈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附錄二」，頁4-5。

¹⁵ 見夏鼐、王世民，〈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頁1-2。

¹⁶ 曾昭燏，湖南人，爲曾國藩的大弟曾國漢的長曾孫女，一九二九年入南京中央大學國文系就讀，一九三三年畢業。一九三五年入倫敦大學習考古，一九三七年獲碩士學位，其後前往德國博物館實習，一九三八年回國，任中央博物院專門設計委員、總幹事。一九五〇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一九五四年升院長。一九六四年在南京靈谷寺自殺。

次是「近東考古」（包括米索波大米及伊蘭等），現今傅既贊成夏鼐往學埃及考古，故夏鼐勸曾氏專心致力於近東考古學——巴比倫或伊蘭，並勸他放棄測量、製圖、地質及人類學等科學之課程，專注從事「文字」和「歷史」的研求，將來或可以近東的一種文字和文化發展的歷史與中國的相比較。曾氏頗為認同，更親自致函向傅氏請教：

（前略）冒昧的寫信麻煩您，希望您為我個人著想，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著想，我學什麼東西，最有用處，趕快回信給我，因為我在暑期中必須決定下期的計畫，您既然不憚煩的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憚煩的指教我。¹⁷

傅斯年很快的回了信，但原信無從得見。從曾昭燏同年九月三十日致傅的回信中可以窺見傅對曾昭燏求學路徑的建議：

前次承賜書，對於我求學的事，詳細的指導，非常感激。……您所說的以「博物館學」為研究之目的，我想是最好的方法；一則中國於此道尚不甚發達，專學此者似尚無人，二則於我自己也較為方便；所以我決定向此方面進行，現在即在柏林兩個博物館做「古物保存」的實驗，……。¹⁸

其後，曾昭燏至德國學習「博物館學」，¹⁹曾昭燏日後成為我國著名的博物館學專家，對國家的貢獻——如夏鼐氏，其關鍵在於：研究方向之確定，亦如夏鼐氏。兩人均賴傅斯年一言以決之。

改攻埃及考古學後的夏鼐，表現傑出。在 Granville 教授指導下，研習埃及古文字，並數次前往埃及、巴勒斯坦進行調查發掘。一九三八年春，夏鼐在倫敦《埃及考古學》雜誌上發表〈一個埃及短語在漢語中對應例子〉一文，在埃及學研究中嶄露頭角。一九三八年夏鼐的清華公費期滿，指導教授 Granville 替他向倫敦大學申請到瑪利（Douglas Murray）獎學金，得以繼續在英研究。一九三九年並到埃及開羅博物館進行移地研究，從事博士論文埃及出土石珠之研究，後因歐戰爆發，夏鼐滯埃達年餘，一九四〇年底，始取道西亞、印度、緬甸，於一九四一年初返抵國門。²⁰進入導師李濟主持之中央博物院（時遷四川南溪李莊），擔任專門（設計）委員之職。兩年後，一九四三年轉任中研院史語所任職，職稱為副研究員。

¹⁷ 〈曾昭燏致傅斯年函〉（1936.6.19），《傅斯年檔案》（以下簡稱《傳檔》）II：460。又見王汎森、杜正勝主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印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頁214-215。

¹⁸ 〈曾昭燏致傅斯年函〉（1936.9.30），《傳檔》II：460-1。

¹⁹ 見〈曾昭燏致傅斯年函〉（1937.2.8），《傳檔》II：460-2。〈濟（李濟）致孟真函〉（1937.4.9）有云：曾女士事，弟完全同意兄之辦法，即（一）補助15000元，以一年為限；（二）到德國學博物院陳列及保管古物方法；（三）一年後回國服務。見《傳檔》III：1397。

²⁰ 此段經歷，以岱峻，〈半個蠶繭包含的歷史風雲〉（載於《粵海風》2006.3：35-42）所述最詳實，可以參看。

三、夏鼐入史語所後與傅斯年之互動——西北考察團期間

夏鼐至中研院史語所任職（1943）以前，與李濟關係最為密切。傅、夏之間的聯繫亦靠李濟之傳遞。此固與自夏鼐考取公費留學（1934）後，李濟是他真正的導師，傅斯年與他的關係較為間接。但一九四三年夏鼐以副研究員身分轉至史語所任職後，情況稍變，李濟（第三組，考古學組主任）固為直屬長官，但擔任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亦是夏鼐名實相副的直屬長官，傅、夏從此有了較密切的直接接觸。

夏鼐到史語所服務後，很快嶄露頭角。其關鍵即在參與西北考察團工作的傑出表現。按西北考察團是抗戰爆發後，由於日人竊佔我國東南經濟發達區，國家社會遂興起一股「西北考察熱」，政府與民間團體紛紛組團至西北——陝、甘、寧、青各地考察。負國家最高研究重任的中央研究院，即在一九四二年春，與中央博物院、中國地理研究所（中華教育基金會所轄）合組西北史地考察團，計畫在陝、甘、寧、青等地從事考古、歷史和地理的調查。從學術發展史來看，此次是繼一九三〇年中國與瑞典學者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之後，完全由中國學者自主、自力從事西北史地研究的第一次，意義極為重大。從史語所創建以來的學術目標來看，也是極具突破意義的一舉。按：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對史語所未來工作曾有寬廣之藍圖。他說：

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安陽殷墟以前盜出之物並非澈底發掘，易州邯鄲又是燕趙故都，這一帶又是衛邶故域。這些地方我們既頗知其富有，又容易達到的，現在已着手調查及佈置，河南軍事少靜止，便結隊前去。第二步是洛陽一帶，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就脫了純中國材料之範圍了。為這一些工作及隨時搜集之方便，我們想在洛陽或西安燉煌或吐魯番疏勒，設幾個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²¹

從事西北考察，特別是突破河西走廊地區中西文化交會處的若干歷史、考古課題，實為傅氏宏偉學術規畫中關鍵的「鑿空」事業。一九四二年三月，傅在李濟喪女、身心俱疲時，勉勵李濟親身參與西北考察團，以成就安陽之外的另一大工作。其致李濟函云：

²¹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9。

安陽報告固爲一事，此外尚須有一大工作，方可對得起此生。弟所以勸兄一往西北者此也。……兄之一生，至少須于安陽之外，再有一大事，方對得起讀書三十年也。²²

由此可見傅氏對西北考察團業務之重視，但在彼時此項學術工作一受限於經費（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一九四二年滇緬公路爲日人截斷，抗戰陷入最艱苦階段，經費十分拮据），二受限於人才，初始傅並不贊成考察團之計畫。²³傅與李濟在致辛樹幟（按：考察團團長，西北農學院院長）及葉企孫（中研院總幹事）函中有云：

燉煌初步考察，西人走之已熟，煌煌巨帙，學人共喻。今茲之行，弟等感覺必須稍有所得，若漢簡及漢唐遺物能有特殊發現，始免貽笑他人。若仍係試探性質，則西籍具在，展卷可當臥遊，何必捨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走此一趟哉？²⁴

傅信中所指「吾人更重要之工作」指安陽發掘報告之撰寫（「此爲弟十年心願」），因此主張中央博物院應多派人手，在李濟之提出史語所參與考察團之勞榦、石璋如及高去尋三人中，主張留下高去尋專力撰寫安陽發掘報告。並謂以此等經費與人力從事西北考察，「必無結果」、「必一無成績」！²⁵

石、勞二氏的西北考察工作，在傅事前並不看好下，於四月一日出發執行。到次年（1943）一月廿九日離開蘭州，前後在西北歷十閱月，考察河西、敦煌、千佛洞、玉門關、陽關（遺址），並往寧夏黑水流域。石璋如原先預定之考察重點「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窪及沙井）文化，竟未能展開。事後，勞榦先生發表了數篇重要論文，石璋如先生則將其測繪之千佛洞石窟圖及照片整理出版。²⁶

一九四三年底夏鼐由同在四川南溪李莊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轉任史語所副研究員，因緣際會的從一九四四年起參加了西北考察團第二階段的工作。其實傅自夏鼐轉習埃及學後，早有意聘夏鼐來史語所服務，但礙於夏是李濟的學生，不好越俎代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傅致函中研院葉企孫總幹事說：

²² 〈傅斯年致李濟函〉（1942.3.30），見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315，以下簡稱《李濟瑣記》。

²³ 該計畫分歷史考古、地理及植物三組，實際執行者僅前二組。歷史考古組組長是代表中央博物院參加的西南聯大教授向達。但未與石璋如、勞榦二人同行赴西北。見《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頁248。

²⁴ 〈傅、李致（辛）樹幟、（葉）企孫函〉（1942.4.15），轉引自邢義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古今論衡》8（2002）：47-48。

²⁵ 〈傅致葉企孫函〉（1942.4.22），轉引自邢義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頁48。

²⁶ 即石璋如，《莫高窟形》（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一書。有關石、勞西北考察經歷，詳參邢義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一文。

一、夏鼐之學問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中央〕博物院亦重視之（濟之前云，「既要我辦博物院，我也要留個好的）。去年〔1941〕1月，博物院鬧窮，弟正在李莊〔病前〕，對濟之云：「可撥一位過來，自郭子衡至王孤鈞，隨濟之意，依我看夏鼐最好，不過仍由兄決定」。濟之決定撥吳金鼎過來。二、為考古組人才計，本所目下應該請他。三、本所經費，用得超過。弟久懷疾戾，此時不敢提議大薪水之人（要來當為副研究員，其薪當在300元以上），而路費浩大，亦一問題也。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與濟之商定，至感！²⁷

得以爭取到夏鼐轉任史語所後，傅氏特請曾昭燏致函夏鼐，促其自溫州家鄉早日返回李莊，參與第二次西北考察團之任務。

第二次西北考察團歷史考古組成員，仍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組成，另外新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一九四四年三月西南聯大之向達教授（代表北大）及史語所之夏鼐在重慶會合，在三月二十一日及四月四日分別飛抵蘭州。由於向達曾參與第一次考察團任務，在敦煌工作過一年，對河西已有相當之認識。故初期夏鼐與另一團員閻文儒在向達率領、指導下展開工作。夏鼐在甘肅地區前後工作近二年（1944年4月抵蘭州～1945年12月18日離蘭州），工作可分前後兩期。前期自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乘機自重慶飛抵蘭州始，終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返抵蘭州止，主要工作由蘭州西去，經酒泉（專程赴金塔縣考察漢代烽燧），到敦煌，除考察千佛洞外，先後駐敦煌佛爺廟及寧州廟發掘，基本上釐清自漢末迄隋唐墓葬之特色與差異。駐敦煌期間又往西去探尋古玉門關及陽關遺址，在小方盤城掘獲漢簡數十枚，並獲晉泰始石刻殘碑。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東返，經安西、玉門、酒泉、張掖、武威，於翌年（1945）一月十五日返抵蘭州。後期則由一九四五年一月返抵蘭州後，利用考察餘款，又獲得史語所經費支助「供生今夏考察之用」後，繼續留甘肅工作，重點則易為釐清新石器時代諸甘肅文化間關係的課題，先後在寧定陽洼灣、民勤之沙井、武威喇嘛灣之唐代吐谷渾墓葬、臨洮寺洼山及蘭州之高坪、中山林、太平溝、十里店等遺址考察及發掘，重新省視 J. G. Anderson 關於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期問題，²⁸至該年十二月十八日離開蘭州返川止。前期經過，因夏氏嘗自撰〈敦煌考古漫記〉一文，

²⁷ 見岳南，《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223。另見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夏鼐致李濟函〉（《李濟瑣記》，頁317），則李濟已與朱家驊談妥調夏鼐入史語所，並於十月十三日電報時居溫州的夏鼐。

²⁸ 夏鼐在陽洼灣齊家墓葬的發掘，首次從地層學上確認仰韶文化的年代早於齊家文化，更正了安特生甘肅史前文化的分期。詳見 Shiah Nae, "New Discovery of a Ch'i Chia Culture Cemeter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6.2 (1946): 169-175.

詳述其經歷。²⁹ 史語所特聘研究員邢義田先生復據史語所藏夏氏發掘漢簡、石刻資料，及《傅檔》中留存夏致傅斯年函件，撰作〈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一文，³⁰ 對夏氏重要發掘成果——漢簡及晉泰始石刻兩事有重要之補充，故對此一階段經過，本文不再多贅。而此期之工作成果，如漢簡之發現是繼史坦因（Stein）以後國人首次於敦煌獲得漢簡，又據漢簡及晉泰始石刻等新資料對漢晉間西北情勢增進了解（如漢玉門關址的考證）等均是重要的發現。夏氏以信函報告傅斯年後，獲得傅氏相當的讚賞，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傅致夏鼐函說：

弟就兄之報告看，極為滿意。將來之工作，可以此為藍圖。發現書簡，尤妙，足徵此物尚多也（已發現者當歸研究所）。兄有此旅行經驗，當亦得些益處。本所考古事業之前途所望於兄者多矣。³¹

並在次日致朱家驊（中研院代院長）函中說：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為之一人，在濟之兄領導下，將來於考古界之貢獻必大。³²

傅同時決定令夏鼐續留西北，再做調查考古工作一年。夏鼐得信後，致書傅氏云：

（前略）供生今夏考察之用，令生多得訓練，多獲經驗，具見提攜後進之盛意，銘感之至，敢不益行努力，以報知遇。³³

第二期工作於焉展開。其間經過，夏鼐皆有信致李濟與傅斯年，該年八月十九日函云：

（前略）七月底由武威赴永昌皇城灘考察，……其時間文儒君由陝來參加考察團，遂一同赴武威北之鎮番縣考察，八月十一日由鎮番縣城出發，行二日抵紅沙梁，已在長城邊外，附近戈壁中有連古城及三角城廢址。當即前往考察，並在三角城稍作發掘，知連古城為唐代古城，於其城檢得開元錢十餘枚，陶片亦為唐代灰陶。三角城則屬於安特生所謂沙井期，掘得沙井期彩陶及鐵片，知已屬鐵器時代，安氏初以為金石並用期（2000~1700BC），自屬大誤，頗疑屬於漢代所雇之異族戍兵所居，否則當為秦漢時異族所居，漢代繼續居住其地，安

²⁹ 該文初撰於一九四九年夏氏離史語所居故鄉溫州期間，共10章，部分曾連載於《考古通訊》（1955-1956）。今本見同名該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由王世民、林秀貞據其日記補撰五、六二章，完整敘述其在甘肅第一期之工作。該書另有下編，收夏鼐一九四九年以後重要文章不少。

³⁰ 見《古今論衡》10（2003）：60-69。

³¹ 轉引自邢義田，〈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頁61。

³² 同上註。

³³ 〈夏鼐致傅斯年函〉（1945.2.1），《傅檔》I：1272。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夏鼐另有致李濟函，亦可參看。見《李濟瑣記》，頁322-323。

氏修改後之 600BC 之說，恐仍嫌過早。現已返鎮番城，日本投降之消息，今日返城始知之，八年抗戰得如是結束，誠屬欣幸。生現擬仍照原來計劃繼續工作，惟以甘肅今年旱災，入夏以來，此間麥價每老石由六千元漲至二萬五千元，未免影響工作經費。且生以抗戰結束，急欲返里省親，一年以來未接家信，僅去冬得老父病危一電，今抗戰結束，交通不久即可恢復，預計此間工作，十月間即可結束返蘭，冬間留蘭整理一事，擬即作罷論，先返所銷差，然後即請假歸家，惟不知所中何時搬回南京，生返川抑逕返南京，尚乞示知。³⁴

該函先述考古發掘結果，對安特生（J.G Andersson, 1874-1960）沙井期年代問題重作推估。繼而述及日本投降事，字裡行間雖極平靜，然因內心之激盪，未來之行止則頗有改易，先公後私、先學術後家事之精神躍然紙上。傅氏之賞識夏鼐或非僅止於學術一方面，由此函或已能窺端倪。九月十一日再致函傅氏：

生前函中謂沙井文化當在戰國及漢初，似較安特生之說，為較近於事實。……生自鎮番工作結束後，已於昨日返武威，擬於日內赴甘州調查，在甘、涼一帶再工作一月後，大約十月中旬可以返蘭州。如屆時經費尚有剩餘，生或溯黃河赴西寧一帶調查，但天氣已寒，青海地勢較高，屆時恐已地凍不能發掘，僅能考察調查而已。³⁵

十月五日，夏又致函傅氏：

生於九月十四日由武威出發西行，翌日抵張掖。十六日赴張掖西之所謂「黑水國」遺址調查。公路貫遺址而過，路兩側陶片及碎磚頗多。聞馬步青軍長在此以兵工築路時，同時挖古，所掘之墓葬達數百座，皆為漢代磚墓，後以所掘之磚鋪路面，由崖子村至沙井，長達十餘里。（或謂鋪路之磚，係拆毀古城垣而得，實屬傳聞之誤）附近有二古城廢址皆在砂磧中，現下已無居民，城垣皆係板築之土牆，其中之一（俗稱北城子）當即漢之鶻得故城。太平寰宇記云：鶻得故城在張掖西北四十里，與今日之廢址距張掖之里數及方向正合。馬軍長所盜掘之墓坑，今尚顯露可見，皆為漢墓，規模可觀，以鶻得為當時之郡治也。生試加發掘，居然發現一未經馬軍長盜掘之漢墓，……此墓古代曾盜掘，然剩餘之物尚多，可以攷見漢代西陲之文化。又在遺址附近砂磧中檢得新石器及彩陶片，與臨洮之甘肅仰韶文化相近，但遺物甚稀少，似由青海過扁都口分枝偶至此間。至於「黑水國」一說，古無所聞（乾隆甘州志亦僅稱之為西城驛古址），

³⁴ 〈夏鼐致傅斯年函〉（1945.8.19），《傳檔》I：1268。

³⁵ 〈夏鼐致傅斯年函〉（1945.9.11），《傳檔》I：1271。